



人性的变与不变

教化即先天存在的。所以人性既不是本来的善,也不是本来的恶,而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复杂体。所以孔子只说“性相近”,并没有“恶”和“善”的界定,因为实在太复杂了。就此看,孔子是最高明的。

我们从李白和杜甫的文字中不难注意到:他们是那么敏感的人。这样的人一旦做下了有伤自尊的事情,会是非常痛苦的。比如杜甫,有一首诗里就说到他最感耻辱的一些事,叫做“干谒”——为了博取功名而奔走。像写自荐表、跑关系等等,统称为“干谒”。“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杜甫这样描述自己悲惨的境遇,但仍然恳求“伏唯明主哀怜之”。李白也回忆过当年“干谒”的狼狽:“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他们怎么会没有强烈的狼狽、尴尬、耻辱的感受,这在他们的文字里一再得到印证。

郭沫若先生在晚年也谈到了李白和杜甫不堪的一面,但是非常节制,常常是点到为止。因为这或许要产生一些现实的反思,是难以回避的。1949年前后,特别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对于郭沫若先生来说是清楚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杰出作家们在哪里?知识分子在哪里?有许多在监狱和农场里。有的知识分子只是苟活,或者被杀掉,已经不在人间。当时议论李白杜甫与权力的关系,就需要面对那样

的社会现实,不由自主地产生诸多联想。同时我们不要忘记,郭沫若先生谈论这一切的时候,“文革”还没有过去,他自己正接连遭受老年丧子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先生能够如此论说诗人和庙堂的关系,已经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另一方面,李白让郭沫若特别珍爱,因为这是对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古代诗人,他不忍将其过于贬损。实际上把李白树成千古不朽熠熠生辉的民族诗人的,正是李白自己的文字;但同样也是这些文字,却差点毁掉了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李白是一个饱含剧烈矛盾的人:一方面极其敏感和自尊,另一方面又极其麻痹,常常扔掉自尊于不顾。

这种情形我们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唯一的价值尺度就是官阶,一个人只要仕途顺达就算不容置疑的成功,仿佛不再其他的尺度和标准。从李白杜甫到现在,一千多年过去了,顽固的“国本”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只能看成是一个族群的大悲哀。

当然我们不能去苛求古人,不能用一厢情愿的思维模式去评析古人。但人性中总有不变的东西,比如在权势面前,利益面前,人的高贵和自尊怎样安放,这仍然还应该是古今相同的。从这个层面上讲,今人仍然在为一千多年前的李白和杜甫感到遗憾和疼痛。

非常文青

不急于发表

唐宝民

前些天在一家论坛看到友人们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每月发表多少篇文章,才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作者?这一问题使我联想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关于学者傅斯年的;另一件是关于学者陈垣的,或许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启发。

著名学者王叔岷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那年秋天,他兴致勃勃地到研究所所在地的四川南溪县李庄报到。到达李庄后,他先拜见了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问王叔岷:“你想研究什么课题?”王叔岷说:“《庄子》。”傅斯年点了点头,说:“要把才气洗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傅斯年的这句话说得王叔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按他的理解,多发文章是显示自己实力的体现,为什么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呢?但他也不敢争辩什么,只好按照要求去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术研究上,从校勘训释入手研究《庄子》,后来终于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在庄子学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有了成就的王叔岷,再回想初到研究所时傅斯年对自己提出的“进所三年不得撰文”的要求,忽然明白了傅斯年的良苦用心。原来,做学问最忌目光短浅、心浮气躁,“板凳要坐十年冷”,只有心无旁骛地潜心做学问,才能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就。

目录版本学家牟润孙曾师从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据牟润孙回忆,陈垣先生也不主张多发文章。陈先生说:“写学术文章,不可不力求慎重,对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成熟,就拿出去发表,将来极可能有悔其少作之感。”“悔其少作”一词,出自汉代杨修的《答临淄侯笺》:“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是指不满意自己年轻时未成熟的作品。鲁迅先生在《野草》序言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由此可见,随便发表文章,既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应该引以为戒,以免将来产生“悔其少作”的感慨。

当然,此种做法仅限于真正想在文学事业方面有所建树的人,如果写作的只是为了赚稿费,则另当别论,否则的话,没有一定的发表量作保证,恐怕就有吃不上饭的危险了。

白瑞雪

顾客们还未到来,老板一家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他们决定碰碰运气,到厨房里寻找一种安全的食材。仍在保质期内的牛肉饼,是上天的恩赐;依自然周期生长的鸡翅膀,则是家禽中的极品。稀有的食材配以随机的食用方法,使得这份食物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让以身试法者以身试吃,并不是中国网友的发明。巴顿将军严惩降落伞质量的故事,想必大家耳熟能详了。前不久我在一个装备展上,也见到了了一位主动“跳伞”的老板。滚动播出的视频画面里,这位年过半百的防弹车制造商端坐驾驶室,任凭着子弹啪啪撞击车身,岿然不动。拿自个儿性命抽查检验,悲壮的背影最靠谱。

其实我对洋快餐颇有好感,在公厕文化不甚发达的我国,麦当劳、肯德基提供了最洁净并永远不缺手纸的厕所。据说这些快餐店在北京、济南等地的多家门店已经不卖汉堡了。我想,在给公众一个交代之前留作公厕,那也是极好的。

孙君飞

具体到一个人,还要看他为了进入那个体制的高层,或是进入高层之后,表现出的千差万别。这恰恰是最能够检验道德操守的。如果为了进入那个体制,达到高位而使尽伎俩,留下了许多不良的人性与道德记录,那将是另一个问题,必要受到追究。这些追究更是留给历史的,那是一个足够大的近乎无限的时间,可以容纳无数人的评判,个人的言与行,诗人的言与行,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凭据——除非可以推翻这些言行,证明这些记录是虚假的。

郭沫若先生试图做“推翻”的工作——他在《李白与杜甫》中曾为李白的一篇自荐表申辩,认为是后人伪造的,但最终并没有得到佐证。

人性中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是难以开脱的,这一点古今皆是。

今天我们不带成见地去比较三种关于人性的论述,觉得谁最高明?好像孟子说得不准确,他的“性本善”有些简单,因为

有不堪的人格。他们在“治”的位置上发挥个人的能力,如果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安顿民众的生活,这也诚乎可贵了尤其需要我们深思的是,今人未必可以居高临下地指责唐朝的体制,因为我们不能以简单的“进

灯



灯点亮,慢慢放松,渐渐平静,甚至渗出莫名的愉悦。在我看来,夜晚的秩序感最为强烈,不像白天那么忙乱,黑色的经纬线交织出精致细密的网,走到哪里都被夜的魔咒罩着,人变形为爬行的小昆虫,谁也突破不了层层叠叠的暗网——于是,我们召唤来了灯,天空召唤来了星星。任何光都是对秩序的破坏,轻对重的破坏,我痴迷于这种破坏,犹如对游戏的痴迷,听不到打碎玻璃般的声响,只有小精灵扇动翅膀的窸窣窸窣,余音袅袅的吟唱。

白昼里的光,唯有一块块压下来的考验,带着盐和泪水的咸味,还有硌脚的疼痛。而夜的灯,抚慰着妈妈,抚慰孩子,也抚慰着此时此刻的整个村庄。生活不再瘦骨嶙峋,我借此触摸到它的肌肤,有一些饱满,有一些温热,汗水里散出青草香,野花香,灯光一闪,我窥探到生活的乳牙和灵魂,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妈妈!”我叫一声灯光中的妈妈。妈妈抬头看看我,疼爱地笑一下,继续埋头去缝缝补补,那么漫长的缝缝补补。

妈妈知道我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只是想叫一声妈妈,也不在乎她到底答应不答应,不答应,她也永远是她的妈妈!灯光黯淡了一下,妈妈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亮。第二天清晨,我们就能够穿着她缝补过的衣服,灯光抚慰过的衣服,明亮得跟新做的一样,醒目地走向学校,或者铺满露水的田野。

滚向前,人类贪婪之心日盛,人为因素逐渐成为食品安全的关键。汉朝规定,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的话,应尽快焚毁变质食品,否则将处罚肇事者及相关官员。唐朝严格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通,如果食品变质,食品所有者必须立刻销毁,否则要被杖打90下;不销毁却送人或继续出售而致人生病,判处徒刑一年;如致人死亡,食品所有者将被判处罚金。宋朝则要求食品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业,而行业则对商品质量负责。

质量是设计出来的。中国自古重视食品安全,对违法行为施以重典。然而,当移民接天瞒天过海能把王宝强打扮成许文强的现代技术与食品相遇,鉴别变得异常困难。设计出一种完美无暇,点滴不漏的监管机制目前似乎还不太可能,而道德的血液已经被证明如蒙在鼓里的心情一样经不起考验。

让制造者及其老婆孩子作每批食物的首尝者,或为一个不错的主意。那温馨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

学,文学,帮我们“看见”各种各样“别人”的生活。

作家大概也分成三种,坏的作文家暴露自己的愚昧,而好的作文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呢?是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也认出自己的原型,从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

在《人性的变与不变》中,兼具敏感的直觉和高度理性的观察中,我们看见,“李白是一个饱含剧烈矛盾的人:一方面极其敏感和自尊,另一方面又极其麻痹,常常扔掉自尊于不顾。”这是“因为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唯一的价值尺度就是官阶,一个人只要仕途顺达就算不容置疑的成功,仿佛不再其他的尺度和标准。”

从李白杜甫到现在,一千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照见我们本身的“遗憾”和“疼痛”。文学还让我们看见,他人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另一种现实。

《灯》里,黑暗中与光的游戏令人神往——“我在嬉戏灯光的舞蹈状,飞翔状,一会儿觉得在光的波里游泳,一会儿觉得在光的襁褓里伸手蹬脚,点亮的灯,跟夜碰撞出火花,一下子减去了所有事物的重量,包括人的忧伤、苦闷和寂寞。”

我们也要找到这美,这黑暗中的光,找到它们,就找到了方向,就不会为眼前障碍所惑。

编辑手记

流年碎笔

同心传译

没有你的平安夜

孟心怡译

不管怎么耽搁,买圣诞树这事都不会变得容易起来,我提醒自己。路过林园很多次了,我却从没进去过,这次再也不能错过了。六个月前,癌症夺走了我英俊的丈夫维尔纳。当失落感尖锐的边缘割断了联系着我和他的心弦时,我从失落感中找到了它的一个明显特征:初次体验。在没有维尔纳的情况下初次体验各种各样的事。

时间滴滴答答地流走,这些“初次”在不经意间伴随着我度过了每一天。即使其中有些更容易熬过去,我还是感觉到维尔纳的死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那个锯齿边缘的洞。即使是他为我做的最细微的事,那些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事,都在失落的对比下变得铭心刻骨。买圣诞树尤其难,我害怕在林园等着我的情感交锋。我忧心忡忡着,直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圣诞节就快到了。一想到要告诉家人今年没有圣诞树,我就万分苦恼。常绿植物本身并不特殊,但里面包含着瑞士的古老传统,维尔纳和儿子斯迪凡、于尔格33年来一直遵循这个传统,以至于这成了他们每年期待的仪式。但这些年来,我从未自己挑选或购买过圣诞树。

我把车开到了林园。我深吸了一口气,下了车,从两排香脂树和云杉间穿过。浓浓的树木香气吸引了我,并把我瞬间带回过去。那时斯迪凡三岁,坚持要拖着大铲子,用小手握住铲子巨大的把手,挣扎着压过庭院里长高的草,一路拖进森林。每走几步,铲子就会从小手里滑落。斯迪凡会停下,捡起铲子,再继续他的行程。他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为父亲选一棵小香脂树。我给斯迪凡讲维尔纳在瑞士度过圣诞节的故事时,他把每棵树都检查了一遍。

“圣诞老人不去拜访瑞士孩子的家。”听到这,斯迪凡皱起了眉头。“但是,在圣诞节一周前的圣尼古拉斯日,瑞士的孩子会收到巧克力和特别制作的饼干。他们的圣诞节只是单纯庆祝耶稣诞生。”斯迪凡又开心起来。我告诉他,圣诞节到来时,爸爸一家会在起居室里放一棵小香脂树,用橘子和自制装饰品把树打扮好,再把把烛台夹到枝头上,每个烛台上安一支小蜡烛。

“晚饭后,他们唱起颂歌。每个人都拿着蜡烛。当所有蜡烛被点亮时,他们就唱‘Stille Nacht(德语的平安夜)’。那能让他们想起耶稣是

把车开到了林园。我深吸了一口气,下了车,从两排香脂树和云杉间穿过。浓浓的树木香气吸引了我,并把我瞬间带回过去。那时斯迪凡三岁,坚持要拖着大铲子,用小手握住铲子巨大的把手,挣扎着压过庭院里长高的草,一路拖进森林。每走几步,铲子就会从小手里滑落。斯迪凡会停下,捡起铲子,再继续他的行程。他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为父亲选一棵小香脂树。我给斯迪凡讲维尔纳在瑞士度过圣诞节的故事时,他把每棵树都检查了一遍。

“圣诞老人不去拜访瑞士孩子的家。”听到这,斯迪凡皱起了眉头。“但是,在圣诞节一周前的圣尼古拉斯日,瑞士的孩子会收到巧克力和特别制作的饼干。他们的圣诞节只是单纯庆祝耶稣诞生。”斯迪凡又开心起来。我告诉他,圣诞节到来时,爸爸一家会在起居室里放一棵小香脂树,用橘子和自制装饰品把树打扮好,再把把烛台夹到枝头上,每个烛台上安一支小蜡烛。

“晚饭后,他们唱起颂歌。每个人都拿着蜡烛。当所有蜡烛被点亮时,他们就唱‘Stille Nacht(德语的平安夜)’。那能让他们想起耶稣是

也许明年就会习惯……



读史札记

也说李白与杜甫

中国有一种“忍”的文化,比如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标”,就可以忍受和妥协——“英雄能受胯下之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韩信曾有过“胯下之辱”,但后来成为大将军,也便成为了英雄行为的一部分。但不要忘记“胯下之辱”仍旧存在,那是一种大辱。如果韩信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的形象不是更为高大吗?再说,如果一个英雄人物不要耍权谋,不曾摇尾乞怜,难道会因为缺少戏剧性而留下什么人生遗憾吗?

为了成功,为了那个目标,一切的曲折忍让都可以理解和原谅,这成为一部分人的“至理”。其实这正是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是某些人习惯的“手段”与“目的”的“分而论之”,不仅不能看成堂而皇之的理由,而且还是缺乏自我批判力的道德哀伤。

一切都需要以言与行作为评判的根据。诗人的“行”既是行动,也是作品本身,诗与文都是他们人生的重大行为,究竟留下丁怎样的文字,这既是一个“行”的依据,又是“言”的物证。说到“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为封建专制工作,就一定有不堪的人格。他们在“治”的位置上发挥个人的能力,如果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安顿民众的生活,这也诚乎可贵了尤其需要我们深思的是,今人未必可以居高临下地指责唐朝的体制,因为我们不能以简单的“进



流年碎笔

同心传译

没有你的平安夜

灯

孙君飞

刚刚转过身,我便忘了灯原是我点亮的。灯光越来越亮,温暖的奇迹,我竟然认为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小精灵拿魔棒点亮的——这样孩子气的想象,有人会更好心地笑我话。

从很久以前,我学会了眯着灯光出神,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的幻想会去擦亮那么一小会儿。夜的黑那么大,那么重,灯只照耀那么小的空间,我却觉得它的美是无限的。我更动心于灯光的轻,虽然穿越它会留下影子,但我乐此不疲。先是伸长的手臂穿过它,然后是倔强的鼻尖碰到它——整个身体也穿过它:我在嬉戏灯光的光,舞蹈状,飞翔状,一会儿觉得在光的波里游泳,一会儿觉得在光的襁褓里伸手蹬脚,点亮的灯,跟夜碰撞出火花,一下子减去了所有事物的重量,包括人的忧伤、苦闷和寂寞。

妈妈常常就着灯光缝缝补补,我才能够近距离地偷偷瞧她。在白天的田地里,太阳那么大,那么辉煌,事无巨细它都要管,我不敢仔细地看妈妈,现在能了。灯光下的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残缺和艰辛,甚至有了一些温柔安详。曾经青草般的妈妈,从我能够回忆的时候起,就像打了霜的庄稼。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用花朵来比喻妈妈,虽然她一辈子都在泥土里生活着,却永远不会长成一朵花。自己不是花,就在孩子们的衣服上绣上自己梦中的花吧。我想一次又一次地偷偷瞧妈妈,可是怕她察觉,让人脸红,便在灯光中扮小鸟飞来飞去,无声无息地穿越,看灯怎样抚慰她,也看她怎样使夜晚的灯变得越来越深情。

我们家里没有薰衣草和白天鹅,更没有太妃糖,也从来不会秩序井然。笨拙沉重的劳动工具,硬木和钢铁的结合,总是乱乱地放着,所有的孩子也都是乱乱地长大。抱怨过吗?也许真的抱怨过,但是谁能够对着大风长时间地制造抱怨的肥皂泡呢?如果我抱怨过,也至多有三分钟——看到妈妈在烈日下像男人那样干活,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抱怨如同田野里的野草,必须立刻拔去。劳动啊劳动,筋疲力尽之后,有难言的委屈,毕竟还是一个孩子,会想到永远买不到的玩具,怎么办?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夜里,一次又一次争着将

我妈这些天前所未有地焦虑,连广场舞都没法专心跳了。因困扰的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究竟啥还能吃?可以说,上海福喜事件带给广大群众的冲击是原子弹级的。在国产不安全食品频频曝光之后,这事儿动摇了我们对进口食物无私的信心。

犹记站在乌决决一片形迹可疑的景区餐厅之间,我多半会径直走进麦当劳。犹记来京旅游的侄女出门前我总再三叮嘱:买汉堡,别乱吃东西。“洋快餐”自1987年进入中国以来,从一种高大上的象征渐入寻常百姓口,几乎成为“便捷”与“放心”的代名词。曾经就这样被你征服,如今却就这样被你辜负。其震撼,如同模范老公出轨,国民女婿爆婚。陈佩斯精彩的描述过此类情形: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才能当叛徒,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啊!

你看那神州大地各处超市里,进口食品往往是置于单独区域,价格也比国货贵了太多。这般的待遇却并未让其保持纯洁之身,一遇媒体卧底,照样哗啦啦沦陷。究竟是南橘北枳的所谓“本土化”,还是以双重标准歧视中国人民的胃?前辈早就告诫过我们,不出身论英雄。看来,无论国货或洋餐,咱都得永远保持警惕之心,不惮以最大的善意加以揣测。

生存与发展计,其他所有建设之力不过是春风化雨,“吃饱并且不吃死”却是一招制敌——中国如此,全世界同样面临此题。原以为咱早已步入小康,其实尚未解冻温饱,食物品质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原始社会。那时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我们刚学会直立行走的祖先们饿了就抬头摘取晨露晶莹的果子,绝对绿色、有机。

当然,因为无法辨别是否有毒,原始先民面临的食物安全威胁其实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北京周口店猿人时期,平均寿命17.7岁。在漫长的进化中,传说里的神农与伏羲氏以自我牺牲式的艰苦探索带领人们走出了生命困境,伴随着文明车轮滚

滚向前,人类贪婪之心日盛,人为因素逐渐成为食品安全的关键。汉朝规定,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的话,应尽快焚毁变质食品,否则将处罚肇事者及相关官员。唐朝严格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通,如果食品变质,食品所有者必须立刻销毁,否则要被杖打90下;不销毁却送人或继续出售而致人生病,判处徒刑一年;如致人死亡,食品所有者将被判处罚金。宋朝则要求食品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业,而行业则对商品质量负责。

质量是设计出来的。中国自古重视食品安全,对违法行为施以重典。然而,当移民接天瞒天过海能把王宝强打扮成许文强的现代技术与食品相遇,鉴别变得异常困难。设计出一种完美无暇,点滴不漏的监管机制目前似乎还不太可能,而道德的血液已经被证明如蒙在鼓里的心情一样经不起考验。

让制造者及其老婆孩子作每批食物的首尝者,或为一个不错的主意。那温馨的场景大概是这样的——